

Emotional Narratives in *Great Expectations*

JIN Yiran

Ningbo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August 27, 2025

Accepted: September 22,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JIN Yiran. (2025). Emotional Narratives in *Great Expectation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 083–08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1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11>

Abstract: This article situates Charles Dickens's *Great Expectations* within the Victorian discourse of “emotional discipline” and reassesses the affective operations of its narrative voice. The novel's first-person retrospective narration at once restrains emotion through a moralizing tone that fashions respectability, while simultaneously releasing repressed affect through its rhythmic cadence. Pip's trajectory of social ascent embodies the paradox of a “cynical subject”, revealing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fissures produced by emotional regulation, beneath which the middle-class gentlemanly ideal obscures working-class trauma. Jaggers's “vertical stratification of emotions” and Wemmick's “horizontal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emotions” illustrate two paradigmatic strategies for negotiating affect across public and private domains. Through a prose style marked by subdued rhythm and lyricism, Dickens binds individual emotional experience to the broader affective discourses of his time, realizing a distinctive aesthetic of feeling.

Keywords: Charles Dickens; *Great Expectations*; emotional narratives; narrative voic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JIN Yiran is a graduate student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Ningbo University. Her main research focuses o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Victorian novels, and she also engages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combining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She can be reached at: jinyiran700@gmail.com.

《遠大前程》中的情感敘事研究

金怡然

寧波大學

摘要: 本文將狄更斯的《遠大前程》置於維多利亞時期『情感規訓』話語的歷史語境中,重估其敘事聲音的情感機制。小說的第一人稱回顧性敘事一方面以道德化克制的聲音約束情感,塑造體面主體,另一方面又不斷通過韻律感敘述基調釋放被壓抑的情感能量。匹普在階層上升過程中展現出『犬儒主體』的矛盾姿態,揭示了情感規訓下主



體的認知與行為分裂,其背後是中產階級紳士理想對底層創傷的遮蔽。賈格斯的『縱向情感分層』與文米克的『橫向情感區隔』,則分別代表了維多利亞時期個體在公共與私人領域調適情感的兩種典型策略。小說以韻律沈靜的散文筆調,將個體情感體驗與時代的情感話語深深綁定,體現了狄更斯獨特的情感美學實踐。

關鍵詞:狄更斯;《遠大前程》;情感敘事;敘事聲音

一、引言

維多利亞時期(1837—1901)是英國社會結構與文化觀念劇烈轉型的階段,工業革命推動中產階級崛起,『理性』『克製』『體面』成為中產階級的核心價值觀,而『情感規訓』作為塑造合格社會主體的重要手段,逐漸滲透到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從心理學界對『情操』實用性的強調,到社會改革家將情感訓練視為『社會工程』的主張,情感成為被納入功利性、秩序化體系的『可控對象』。

評論家大衛·格維斯探討了匹普敘事聲音的『音樂性』與情感表達的關聯。(Gervais, 1984: 85–114)但對其研究未深入涉及情感規訓如何通過敘事機製作用於主體。實際上,狄更斯作為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學家與社會評論家,其創作始終與時代形成深度對話。《遠大前程》(1860–1861)作為狄更斯『黑暗小說』時期的代表作,擺脫了早期作品的樂觀主義基調,轉而聚焦個體在階層流動中的情感困境,為研究維多利亞時期的情感規訓提供了典型文本。作為時代最敏銳的情感觀察者之一,狄更斯在小說中借助匹普的敘事聲音,不僅探索個體的道德與情感成長過程,也展現了文學家對其時代情感體系的獨特感知。

二、維多利亞時期的情感話語

19世紀,心理學與社會改革理論為情感規訓提供了思想支撐。蘇格蘭心理學家亞歷山大·貝恩在《情感與意志》(1859)中提出,『情感(Sentiment)的價值不在於其本身的強度,而在於它能否引導個體行為與社會義務契合,其現實根基是實用與功利的』。(Stedman, 2002: 149)社會改革家查爾斯·布雷則在《情感的教育》(1872)中進一步將情感訓練提升至『社會工程』高度,他以『郵政系統』為隱喻,指出『如同郵件需分類投遞以避免混沌,人的情感也需引導控制,方能實現「最大幸福」的社會理想』。(Bray, 1872: 138)這一隱喻既體現了中產階級對工業時代『秩序』的推崇,也暗含對『情感失控』的恐懼。在布雷看來,未經規訓的情感會如同『無序的郵件』,威脅社會穩定。

維多利亞時期的情感規訓依托於一整套日益精細的話語體系得以實現。一方面,情感被科學化分類,『心』『品格』『情操』等術語成為界定『合宜情感』的符號;另一方面,隱喻的反復使用強化了情感的規訓邏輯。(Stedman, 2002: 161)如薩拉·埃利斯(Sarah Ellis)在《心靈的教育》中將未經訓導的情感比作『洪水』,暗示其破壞性。(Stedman, 2002: 159)狄更斯亦在書信中強調,『心靈若被忽視,會將行動交予激情左右,最終摧毀品格』,呼應了『情感需被引導』的時代共識。(Bray, 1872: 175)正如雷切爾·阿布洛夫所言,19世紀是『情感被馴化的世紀』,文本中的『情感規則』不僅為讀者提供行為指南,更將中產階級的情感秩序轉化為全社會的價值標準。(Ablow, 2008: 375)

三、『無師自通的天才』:敘事聲音與情感秩序

在《遠大前程》中,狄更斯賦予匹普『成年敘述者』與『童年經歷者』的雙重身份,形成情感敘事的『雙重

聲軌』。成年匹普的敘事以『道德反思』為核心特征,其語言風格莊重、抽象,充滿維多利亞中產階級的『情感得體性』意識。格維斯指出,匹普的敘述具有莊重的抒情基調,句子節奏緩慢且充滿沈思性。(Gervais, 1984:90)在回憶為逃犯馬格韋契偷竊食物後未能向喬坦白的經歷時,成年匹普說道:『一句話,先是大膽小,明知不該做的事卻不敢不做;後來也還是太膽小,明知該做的事卻不敢去做……我簡直是個無師自通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方式完全是自出心裁的。』^①此處,成年敘述者採用近乎格言式的抽象語言覆蓋了童年那一刻具體且強烈的恐懼與焦慮。他稱童年偷食物給馬格韋契的行為是『懦弱』,將混沌的情感納入『該做』與『不該做』的道德範疇,稀釋了當時被脅迫的恐懼與同情交織的複雜情感。『無師自通的天才』一語更顯冷漠,將童年的一場情感風暴輕描淡寫地歸結為一種自嘲的性格缺陷。卡羅琳·裏德(Caroline Reid)指出,中產階級將『體面』用作社會控制的工具。(Mommsen, 1981:27)成年匹普對自身經歷的詩意重構,本質上是用維多利亞時期的情感標準,馴化童年混亂的情感,完成體面自我的塑造。可以說,匹普在高度的自覺中完成了情感轉化。正如約翰·基布爾(John Keble)所言,『當情感洪流裹挾我們時,言語表達可成為安全閥』,但成年匹普的『安全閥』是以犧牲情感的真實性為代價的,情感活力隨之流失。(Stedman, 2002:47)

童年匹普的敘事聲音則構成對規訓話語的微妙反抗。匹普童年記憶的『詩意細節』具有『豐富的暗示性』。(Gervais, 1984:89)這種聲音擺脫了道德判斷的束縛,以『音樂性』的節奏,捕捉著情感的流動。在描述初次眺望沼澤地的感受時,匹普的語言掙脫了抽象概念的桎梏:

『墓地對面那一大片黑壓壓的荒地就是沼地,沼地上堤壩縱橫,橫一個土墩,豎一道水閘,還有疏疏落落的牛群在吃草;沼地的那一邊,有一條落在地平線底下的鉛灰色線條,就是河流;遠處,那陣陣緊吹的急風有個老窩,就是大海;望著這片景色嚇得,就是匹普。』(狄更斯,2017:2)

這種語言擁有『獨白的音樂性』特質,它不依賴刻意的修辭,而是通過『一條鉛灰色的線』『刮起的風嘩嘩直響』等感官細節的累積,營造沉浸式的情感氛圍。(Gervais, 1984:95)尤為關鍵的是,敘事中延遲出現的『渾身發抖、抽抽噎噎哭鼻子的小包裹』這一自我意象,直接暴露了童年個體在嚴酷環境中的脆弱。這種脆弱並非成年敘述者所塑造的道德成長起點,而是未經規訓的、原始的情感狀態。童年匹普的敘事還暗含對『情感難以言喻』的呈現。這一主題在維多利亞時期文本中具有普遍性,折射出當時社會對『情感真實性』的矛盾認知:一方面,人們堅信真正深刻的情感超越語言邊界;另一方面,又試圖以理性語言捕捉情感。當匹普將自我認知為『沼澤地、教堂墓地與大海構成的陰郁鄉間』的一個元素時,他實際上是以感官體驗替代語言定義,用模糊的情感合集代替清晰的道德分類。如格維斯所言,匹普的聲音中始終存在一種神秘性,無論多少自我譴責與順從,都無法完全照亮。(Gervais, 1984:95-96)這種敘述選擇構成了對情感規訓的隱性反抗。

四、『我們從未真正快活過一天』:犬儒主體與紳士創傷

匹普在上流社交場所的體驗,映射了情感秩序背後的意識形態幻象。他對『林鳥俱樂部』的敘述以一種諷刺與疏離的語調展開:『這個團體無非是讓會員們每隔兩星期聚會一次,大吃大喝一頓……這所謂增進友誼,指的也無非就是這一套罷了。』(305)此時的敘事聲音處於雙重位置,匹普既置身這場『增進友誼』的鬧劇,又以誇張的比喻和冷眼旁觀的語氣,顯露出一種批判姿態。這種既參與又抽離的敘述姿態,似乎表現出匹普擁有同時從內部視角和外部視角審視自身的能力。然而,匹普並未全然拒絕這種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他進一步坦言:『我們花起錢來總是有多少花多少……我們嘴上都講得好聽,說我們經常過得很快活,而骨

子裏卻是從來沒有快活過一天。我深信,這種情形其實是相當普遍的。』(307)這裏呈現了齊澤克的『犬儒主體』(cynical subject)本質,即他們清楚洞察意識形態面具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裂隙,卻依然選擇緊緊抓住這副面具。(齊澤克,2017:28)匹普清楚看到上流社會『友誼』『快活』等情感符號的虛偽性,卻仍主動參與其中——他揮霍財富、遵從紳士禮儀與社交規範,尋求上層社會認同。在追求『道德』與『體面』的中產階級文化中,這種意識形態幻象構築了社會現實,並深刻影響著主體的行為選擇。匹普所表現的『犬儒式疏離』(cynical distance)便是其中一種。即便他刻意以反諷性的疏離姿態與上流社交圈保持距離,卻依然主動參與其中。

匹普在認知與行為上的分裂,暗示著更深層的主體性問題。齊澤克指出,意識形態在構建社會現實的同時,也始終遮蔽著無法符號化的創傷性內核。(齊澤克,2017:50)作為擁有『遠大前程』的遺產繼承人,匹普卻時常陷入道德與情感掙紮,會因艾斯黛拉一再『說穿』(142)其卑微的出身,而引發他持續不斷的自我懷疑。自卑、貧窮與缺乏教養(71)這些構成他少年時期身份焦慮的核心因素,是以一個無法消解、難以承受的『現實硬核』,而中產階級理想所編織的紳士幻象恰恰將其掩蓋。『成為紳士』不僅是經濟地位的提升,更是情感模式的重構。這集中體現在他對喬態度的轉變中。早年在鐵匠鋪時,匹普與喬共享『樸素而溫暖』的情感。但進入倫敦後,匹普卻對喬的來訪感到難堪:『雖然我和他情深誼厚,可是聽說他要來,我卻並不快意;非但不快意,還相當心煩,感到有些羞愧,尤其念念不忘的是彼此的身份懸殊。』(241)匹普的態度轉變來自其所接受的『情感的階層適配』觀念。他將喬的真誠視為『底層的粗鄙』,將自己的難堪視為『紳士的得體』。正如艾倫·莫爾斯指出,維多利亞時期的紳士情感本質上是一種『表演性的克製』,要求個體壓抑情感,呈現體面的社交姿態。(Moers,1960:211)匹普的成長過程就是不斷摒棄底層社會『粗鄙』的情感表達,習得中產階級的『禮貌性疏離』。處於身份上升中的匹普用社會規訓的情感尺標,切割自己與原生情感世界的聯系。然而,這種情感切割只能是對創傷的壓抑,這導致他陷入自我否定與道德自責的循環。

小說的敘述基調瀰漫一種深切的疲憊,既是匹普情感內耗的體現,也映射了狄更斯本人的中年心境。福特認為,狄更斯後期小說逐漸喪失早年的蓬勃生命力,透露著一種『世界性的倦怠』。(Gillard-Estrada, 2018:63)《遠大前程》更是『一部沉寂之作』,出自一位對『生活滋味已漸麻木』的作家。(Gillard-Estrada, 2018:66)小說陰鬱的敘事氛圍與狄更斯個人的生命經歷密切相關。19世紀50年代,已至中年的狄更斯逐漸對中產階級產生幻滅感,而這部分也源自於他對自己年輕時未經審視便奮力追求的紳士理想,以及早年輕易獲得的成功的反思。他在致好友福斯特的信中甚至流露出傷感的自憐,抱怨自己常被『某種強烈的失落感所壓倒:仿佛生命中從未真正擁有過幸福,也從未得遇知音與伴侶』。(Moers,1960:231)情感生活的挫折與家庭關係的緊張令狄更斯身心俱疲,其作品也隨之愈發複雜、陰暗與沉重,對維多利亞社會的洞察也日益細膩而尖銳。天真的大衛·科波菲爾式角色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匹普這般遊移於英雄與反派之間的道德灰色地帶、難以被簡單定義的『灰色人物』。(Moers,1960:233)憤世嫉俗與悲觀主義塑造了他們挑剔而銳利的洞察力。他們並非投身現實行動之人,而是帶著疏離與批判目光的冷眼旁觀者,始終與所處的社會格格不入。在那個由中產階級價值觀主導的世界裏,他們仿佛是永恒的異鄉人,甚至是被默默放逐的邊緣者。

五、『小不列顛』與『沃伍爾斯』:公共與私人領域的情感調適

賈格斯和文米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情感社會化應對策略。作為倫敦知名律師,賈格斯的情感結構呈現『公共』與『私人』的縱向分裂:在法庭與事務所等公共場域中,他的語言被嚴密包裹於法律話語之中,情感被壓縮至最低限度;而在私人領域,其情感面具偶爾出現裂痕。(Hardy,1985:61)在事務所,賈格斯常借助『我

不知情』『各人的事情各人自己了解』等防禦性表達維持其冷漠姿態。這種姿態並非個人性格使然,而是維多利亞時期公共領域理性化的產物。傑裏米·邊沁(Jeremy Bentham)認為『同情與反感原則本質上是任性原則』,其功利主義理性觀將情感視為『理性的對立面』,推動了公共領域與情感的分離。(Ablow, 2008: 375)作為公共領域的從業者,賈格斯必須壓抑私人情感,以理性與客觀維護職業權威。然而,這種壓抑被非無懈可擊。在匹普追問艾絲黛拉身世時,賈格斯以『試舉一例』的假設性辯詞作為敘事框架,謹慎地使用第三人稱回避具體姓名,卻在敘述中流露出近乎激烈的同情:『匹普,不妨再來作一個假設……與其如此,你還不如用你繫著繃帶的右手先砍掉你繫著繃帶的左手,然後把砍刀交給文米克,叫他替你把那只右手也一起砍掉。』(416)這一殘酷的隱喻折射出他對情感痛苦的深切體會,而他不經意間的點頭、嘆氣等細微動作,也泄露了職業面具下的疲憊與溫情。賈格斯敘事聲音中的法律語體與情感強度形成微妙反諷,由此成為維多利亞時代公共與私人領域情感危機的註腳。文米克稱賈格斯像『一條江河有他天然的深度(城府)』(226),且『像澳洲一樣高深莫測』。(219)這一『深度』隱喻不僅指向賈格斯人格的『潛在性』,更暗示公共理性之下潛藏的情感暗流——情感並未消失,而是被深埋於理性之下,形成『顯在』與『潛在』的縱向張力。

相較於賈格斯的縱向壓抑,文米克則通過空間劃分實踐『橫向區隔』的情感策略。首先,他通過物理空間的劃分,構建起私人情感的『庇護所』。文米克的私人『城堡』坐落在一片『黑沉沉的小巷、水溝和小花園』之中,『幽靜得有點近乎冷清』。(227)那是一座由他親手建造的小木屋,屋頂的『造型和漆色,好像一座架了炮的砲臺』,窗戶『奇形怪狀到極點』,其『哥特式』造型既封閉又獨特。(227)環繞城堡的『護城河』與可升降的吊橋強化了這種自我保護的意識。文米克的建築實踐不僅是一種個人癖好,更折射出維多利亞時期盛行的『隱私崇拜』文化。正如建築師兼文化評論家維托爾德·雷布琴斯基(Witold Rybczynski)所言,自17世紀以來,英國家居理念由『實用』轉向『私密與情感』,房屋(house)逐漸轉化為『家』(home),成為情感體驗與道德秩序的核心空間。(Matt, 2019: 9)家庭被描繪成一種理想的情感港灣,作為對商業領域和公共生活中情感狀態的替代。18世紀晚期以後,家庭逐漸從農業社會的『經濟生產單元』轉向『情感寄托單元』,家庭空間不再僅是生存與勞作的場所,更成為情感價值的載體。(Matt, 2019: 140)19世紀,中產階級將私人領域視為區別於公共領域的『情感庇護所』,強調私人情感不應過度暴露於公共視野。(Stedman, 2002: 47)文米克的父親稱兒子的住宅為『好地方』『名勝所在』(230),這一稱謂使住宅超越了物質屬性,成為家庭情感與個人成就的凝結物。

文米克的雙重生活揭示了個體如何在維多利亞社會的情感規訓中,通過空間與角色的分隔實現自我調適。在事務所,他與賈格斯共同維系『不講情感』的職業理性,而在沃伍爾斯的家庭『城堡』中,他化身溫情孝子,與父親共度恬淡生活。這座『城堡』與小不列顛區(事務所所在地)僅步行可達,卻完全不為賈格斯所知。空間鄰近性與情感隔絕之間的張力,恰恰體現了文米克為私人情感主動劃定獨立領域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感區隔並非純粹出於個體的自由選擇,而是社會『情感結構』內化為個體行為準則的體現。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狄更斯批判社會的獨到之處,在於他能將無數生活細節融入統一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而這種結構恰恰界定了社會的『總體狀況』。(Cheadle, 2001: 79)在狄更斯的筆下,匹普的『主體裂隙』、賈格斯的『縱向壓抑』與文米克的『橫向區隔』,共同呈現出維多利亞社會的三重情感邏輯:情感在個體內部被撕裂,在職業秩序中被壓抑,並在社會空間中被有意分隔。狄更斯正是通過對這種撕裂與調和的書寫,展現了維多利亞社會如何通過情感規訓維系其總體秩序。

六、結語

狄更斯以第一人稱回顧性敘事賦予匹普的聲音一種內斂而克制的莊重感,使複雜的情緒不依賴外顯的



說教,而以平淡口吻娓娓道來。相比早期作品的洶湧激情,這種敘事基調更溫和、更受理性節制,卻更能展現維多利亞時期情感規訓的深層結構。狄更斯捕捉到了維多利亞時期情感規訓的複雜性與強度,沈思抒情的敘事聲音透露出他對情感世界更為細膩的思考,這構成了狄更斯小說藝術最深邃的元敘事。正如批評家芭芭拉·哈迪所言,優秀的維多利亞小說致力於認知與理解,其卓越之處在於從不單一呈現某種情感,而是精確展現情感的交織狀態。(Hardy, 1985: 14)情感既根植於個體體驗,又無法脫離社會的建構。狄更斯通過小說的敘事聲音展現個人情感體驗與社會規訓之間的張力,使《遠大前程》不僅是一部關於個人成長的小說,更是一部關於維多利亞時代情感文化的深邃敘事。

注釋

- ① 查爾斯·狄更斯《遠大前程》,王科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第44-45頁。下文引文均出自該書,只表明頁碼,不再另註。

參考文獻

- ① Ablow, Rachel. (2008). "Introduction: Victorian Emotions," *Victorian Studies*, 50. 3: 375-377.
- ② Bray, Charles. (1872). *The Education of the Feelings: A Moral System, Revised and Abridged for Secular Scho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 ③ Cheadle, Brian. (2001). "The late novels: Great Expectations and Our Mutual Friend",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 edit, John O. Jorda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④ Matt J., Susan ed. (2019).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motions in the Age of Romanticism, Revolution, and Empir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⑤ Hardy, Barbara. (1985). *Forms of feeling in Victorian Fiction*, London: The Chaucer Press.
- ⑥ Gervais, David. (1984). "The Prose and Poetry of Great Expectations", *Dickens Studies Annual*, 13: 85-114.
- ⑦ Gillard-Estrada, Anne-Florence & Anne Besnault-Levita, eds. (2018). *Beyond the Victorian / Modernist Divide: Remapping the Turn-of-the-Century Break i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the Visual Arts*, New York: Routledge.
- ⑧ Moers, Ellen. (1960) *The dandy: Brummell to Beerbohm*, New York: Viking Press.
- ⑨ Mommsen, Wolfgang Justin & Wolfgang Mock, eds. (1981).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1850-1950*,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 ⑩ Stedman, Gesa. (2002). *Stemming the Torrent Expression and Control in the Victorian Discourses on Emotion, 1830-187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⑪ 查爾斯·狄更斯著,王科一譯:《遠大前程》,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版。
- ⑫ 斯拉沃熱·齊澤克著,季廣茂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

(Editors: LI Ruobing & JIANG Qing)